

“一带一路”需要文化包容

■ 梁海明 香港经济学家、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自从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愿景与行动的文件发布后,有关该战略的信息时时见诸中外媒体,成为世界各国热议的话题。毋庸置疑,该政策可助推中国与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建立“命运共同体”,携手发展共进。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醒看到,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有四种文明、上百种语言并存,文化巨大差异下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摩擦。近期已有不少国家公开质疑中国此举是“朝贡制度”的翻版,是建立新的霸权主义,甚至是“围堵”他国。

因此,中国的国民、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举措和言论,以避免沿线国家对中国产生疑惑,否则容易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增加障碍,影响“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对此,中国民众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注重提升自身大国国民的风范,进一步向沿线国家释放善意、消除误解,展现中国人谋求和平发展的诚意,从而扩大中国与各国之间人文交流的深度、广度。

首先,中国国民应避免表现出文化、经济上的优越感,以防上演“一带一路版”的香港自由行风波。

其实,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一国内部,炫耀优越感大都有害无益。以美国为例,美国常以经济上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从高高在上的角度对众多国家的制度、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指手画脚,常遭他国民众的诟病、反感和抵制。

再以德国为例,当年柏林墙倒塌后,原

西德大举经济援助东德,西德的民众、媒体因此产生强烈的优越感,不但以“恩主”的心态与原东德民众交往,更对前往柏林旅游的原东德游客,打出“柏林不爱你”标语及出言侮辱甚至是投掷物品攻击游客,当时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不少东德民众至今心灵伤痕仍未抚平。

随着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部分国人信心也开始膨胀,对于前往港澳地区旅游、购物这种互利互惠的举措,他们也出现了“恩人”心态。这不仅引发茶杯里的风波,并遭到国际媒体大幅渲染后,对国人形象更有所损害。

当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不少国家在科技、文化和经济等领域较中国落后,且部分还需要中国经济援助。对此中国国民、媒体须以美国、德国和我国香港的教训为鉴,收起优越感,摒弃高高在上的心态,应以平等的、友善的、互助的、合作的姿态与沿线各国民众交往、交流,以及对沿线国家抱持“文化包容”(Cultural Tolerance),展现容忍、谅解的气度。这不但可对外展现中国的大国国民风范,更可为中国企业、国民“走出去”,营建一个更加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

其次,中国国民要有胸怀天下的使命感,才能真正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真正支持与合作。

不少国人认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发起国,中国理应通过这一战略获取他国资源、能源,为中国的利益服务。这种的想法和做法,曾经的世界第一大国西班牙、英国都曾有之,

美国现有之。如果中国的国民继续模仿之,不但不能扬长避短,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霸主的和平发展、携手共进之路,也会令原本对中国有期望、渴求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的国家失望,更容易令沿线国家对该战略的动机产生质疑。

在“一带一路”的合作议题上,如果国人表现短视,言必谈中国自身的利益,言必争中国所能获取的利益,而对他国的利益、他国的关切冷漠置之、兴趣缺缺或者没有实际贡献,久而久之,沿线国家会视中国这种举措为狭隘、自私的,它们未来与中国的合作也会逐渐丧失耐心、信心,“一带一路”这个“合唱团”,不免会沦为中国的独角戏。

“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国与国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国际秩序的新模式。因此,中国国民更须有心怀天下、同舟共济的胸襟,在寻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兼顾沿线国家共同利益,以“是中国人,也是地球人”的气度和包容,更多参与全球性的议题,并为此作出应有的、力所能及的贡献。国人更应照顾和重视各国合理的、正当的、实际的需求和利益,只有如此才能“达则兼济天下”,最终和各国实现共赢,也为中国未来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拿到一张令别国心悦诚服的“入门票”。

最后,国人要以身作则,发挥“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传播中国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以此进一步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和尊重。



英国、美国的崛起,分别以“自由贸易”、“民主人权”作为价值体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会带给世界什么价值规范?不少国人认为,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是中国带给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该如何把中国的价值规范完整体现在世界各国民众面前?对此,欧盟的经验可资借鉴。

欧盟的核心价值规范可归纳为:和平、自由、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欧盟各成员国通过各自官方机构的对外活动,运用“五扩散”(无意识扩散、信息扩散、程序扩散、转移扩散和公开扩散)的方式,有意识地积极在国际舞台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和展示自己的规范力量,此举不但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令世界各国看到不同于美国的另一种价值取向,也为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奠定了

基础。

因此,要向世界展现“一带一路”的价值规范,除了国人须进一步在人类和平与安全、国与国之间平等与团结、经贸上的自由与公平以及人类权益的捍卫等方面,展现出胸怀天下的雅量、气度和以身作则之外,中国的媒体、智库和大学研究机构,也应在对外交流、合作中,通过“五扩散”发挥“规范性力量”,以此推广该战略的核心价值观念。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要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要与沿线诸国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和实现共赢,充满挑战,也藏有变数。作为这一战略的发起国和主导国,中国及其国民应尽力展现大国国民的风范,营建和睦共处的营商环境,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支持与合作,助力该战略的成功实施。

人民币国际化的全球银行模式

■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某种意义上,国际货币发行国扮演着借贷货币的地区银行或全球银行角色。美国目前实际上就发挥着全球银行的功能,通过向全球投资者发行安全性良好、流动性充分、但收益率相对较低的美国国债,吸收全球低成本储蓄资金(相当于银行的存款或活期存款),并通过本国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进行全球范围更有效的直接投资和风险投资(相当于银行资产业务)来获取更高收益。

笔者认为,国际货币发行国作为全球银行的功能在于: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短期流动性;在全球范围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扮演全球银行的国家需要具有三方面的优势:一是本国政府在全球具有公信力,这种公信力建立在健全的经济与财政基础上,建立在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上,因而其国债拥有最高的国际信用等级;二是具有规模巨大、流动性充分、安全有效的国债和准国债交易市场,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流动性便利;三是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具有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领先的产业技术水平 and 强大的全球投资、经营和风险管理的能力。

与理想的全球银行功能相比较,美国这家全球银行存在三方面不足。

第一,美国产业结构出现失衡。美国强化军工、粮食生产和金融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产业发展,忽略可贸易产品的生产,导致本国居民可贸易品的消费长期依赖进口,使得 30 余年来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全球银行出现资不低债(海外债务总额大于海外资产总额)。目前美国政府正在启动“再工业化”或“重建制造业”政策,以期逆转产业空心化趋势,实际效果如何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部分金融主管部门的专家认为货币的输出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实现。这些专家很大程度上受到近 30 年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这一经验事实的影响。事实上,从英镑和美元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主权货币在崛起阶段的国际化都是靠资本项下输出而不是贸易项下的逆差实现的。

实际上,正如有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提供,并不需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来实现。恰恰相反,要保持币值的稳定,发行国的对外净资产(即累积的经常项目余额)必须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正值上面。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过程,是发行国利用其资本账户和对外资产负债表进行期限转换的过程。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一家银行的作用:借短贷长。正如商业银行一样,要防止被挤兑,它必须保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

美国在扮全球银行角色时,获取了多大的利差收入(美国学者也称其为“超级特权”)呢?笔者计算了美国因其超强的金融地位所获取好处。在 1996—2010 年期间,美国的经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在于,中国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全球银行”或“地区银行”的角色。这也意味着,将中国建成全球金融强国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

常账户累计赤字是 6.9812 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对外净负债只增加(或净资产减少)了 2.3068 万亿美元。两者之差 4.6744 万亿美元,即为美国作为全球银行的全部金融收益。除了利差收入外,美元贬值引起的美国海外资产和负债价值的变化占了重要部分。美元贬值减轻美国的对外债务并使其海外资产增值。另外还包含金融交易所带来的金融资产净溢价。

第二,美国政府对本国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的海外收益征税的能力受到挑战。全球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通过发行债券承担“吸收存款”功能的中央政府能够分享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全球投资获取的高额回报(利差收入)以弥补其营运成本(比如为保护国家海外经济利益的海外驻军支出)。如果美国联邦政府不能有效征收本国全球化资本的所得税,那么这家全球银行的信用和资本充足率就无法维持。

第三,美国这家全球银行能否为全球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服务正在受到质疑。金融机构获得收益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即金融机构通过他们的中介,将社会稀缺资源从闲置或低效率用途转移到高效率用途,从而导致一个新增财富能在高效率实体经济产业领域中创造出来。全球范围需要防范的是金融集团通过市场操纵或垄断在不改善资源配置甚至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通过提高自身和整体经济的杠杆率,制造泡沫并获得高回报,而将泡沫破灭的风险转嫁给各国财政。这就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背景。

由此可见,人民币国际化的最高境界是强化政府公信力,建设规模巨大、流动性充分、安全可靠的国债市场(包括高信用等级地方政府和央企的“准国债”市场),适时对外开放;同时大幅度提升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避免美国这一全球银行所存在的制造业空心化产业结构扭曲、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弱相关性、以及金融机构利益与全球经济稳发展利益相背离的缺陷;使中国成为促进全球资源有效配置、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全球福利不断增进的“地区银行”甚至“全球银行”,实现与全球利益兼容的国家利益最大化。

但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对 2010 年中国、美国、英国、日

本和欧元区四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总和)的研究现实,在 GDP、出口、对外金融负债和对外直接投资四项指标所体现的全球经济实力进行了比较。

第一项指标是以美元计价的 GDP 总量。排列的顺序为,美国 14.4 万亿美元、欧元区四国 10.3 万亿美元、中国 5.9 万亿美元、日本 5.488 万亿美元和英国 2.256 万亿美元。中国排名第二。第二项指标是更能反映一国全球影响力的出口总价值。具体顺序是:欧元区四国 3.107 万亿美元(其中很大部分是内部贸易)、美国 1.84 万亿美元、中国 1.753 万亿美元、日本 8306 亿美元,英国 6812 亿美元。中国的商品出口已经超过美国,但是美国有很大的服务贸易出口。GDP 与出口总价值反映一国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全球影响力。中国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接近美国和欧元区四国。

但是,就国际储备货币功能而言,第三项对外直接投资与第四项对外金融负债指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第三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指标体现实体经济领域一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控制权和支配权,其核心是拥有和支配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管理秘方。作为一个全球银行,国际货币发行国一方面从全球拆入资金,另一方面又在全球范围进行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指标在金融领域反映一国的生息资产和盈利能力。该指标美国为 4.429 万亿美元、欧元区四国 4.4036 万亿,英国 1.689 万亿、日本和中国相对较弱,分别为 8310 亿美元和 3110 亿美元。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很快,但规模仍无法超过日本。第四项指标是对外负债总额减去直接投资负债得到的对外金融负债,也等于对外证券负债和银行债务之和。这个指标相当于银行的资金来源(存款)。对外金融负债反映一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作为金融中介所能动员和支配的金融资源。产品出口体现的是一国向全球提供商品的能力,对外金融负债体现的是一国向全球提供金融资产的能力。其中一个大项就是美国国债这样的国际储备资产。美国的对外金融负债是 16.585 万亿美元,占全球之首。欧元区四国是 15.512 万亿美元。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英国的金融能量。虽然英国 GDP 只有 2.256 万亿美元,但其所支配的全球金融资源高达 10.297 万亿美元,排名第三。相比之下,中、日两国的金融实力远远落在后面。日本的对外金融负债是 3.551 万亿美元,中国只有 1.085 万亿美元。以对外金融负债衡量一国的全球金融实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国向海外提供安全性良好、流动性充分、收益性适当的金融资产的能力;二是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球投资和配置资源并获取良好收益的能力。

显然,中国要达到与实体经济的全球地位相匹配的全球金融实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笔者将在之后的文章中探讨相关的路径。



■ 黄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鉴于迄今已有 50 余个国家申请加入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人们对该行的关注重点已从担心该行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参与者,以便在国际舞台上确立可信的地位,转变为担心该行的参与者可能过多、以至于无法在重大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现在说说最困难的部分:创建一家开发机构,既要顺应其亚洲借款者的多样化需求,又要顾及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众多出资国对治理问题的关切。

对华盛顿方面来说,考虑到美国国会的负面情绪,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具备加入亚投行的政治可行性。但美方传递出的信息已变得更富建设性——美方原来是坚决反对亚投行,而现在美国财政部高官发表的声明已表示美方愿与亚投行合作。但这些声明依然提到了一些关切,比如意向注册资本为 1000 亿美元的亚投行能否遵循“最高标准”,该行与项目层面上的社会环境影响有关的保障政策也引起了关切。部分稍晚申请加入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即以这类保留意见为由,来解释它们为什么一开始对加入亚投行没有那么积极。

这类告诫可谓不得要领。亚投行在新闻发布会上已暗示,它的目标不是简单复制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等现有机构的所谓“最高标准”,而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来树立“正确标准”。

上述机构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已展开认真的努力来建立效率和响应度更高的准则,但其进展缓慢得令人难以忍受。作为一名曾在世行任管理者、负责过俄罗斯、孟加拉国、尼泊尔和中国等国情迥异国家业务的人士,我可以证明,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工作人员,都觉得世行要求的标准以及许多操作流程太过官僚、成本高、不适合应对借款客户的实际需求。其原因是,治理结构陈旧,另外世行和 IMF 的一些大股东都不愿减少发达国家在董事会的投票权、以反映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更重要地位。

那么,什么是“正确标准”呢?以下是三个关键要素。